

意识形态文论研究的心理学视向

李胜清

(湖南科技大学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意识形态文论研究的心理学视向主要目的在于建构或阐释意识形态特别是文艺意识形态形成以及发生作用的具体独特的微观机制。其内涵包括: 意识形态形成及其存在的感性机制; 社会心理作为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的中介机制;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复杂互动关系; 心理学视向对于意识形态文论研究范式转换的本体论意义等。

关键词: 意识形态文论; 社会心理; 中介机制; 意识形态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 J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4-0457-04

传统的意识形态文论研究由于耽于一种关于文艺意识形态的外部研究或宏观研究,所以在说明文学艺术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与特殊结构时总显得有些阐释不足,为了超脱出这种困境,从一种微观机制来建构或阐释文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存在方式就具有了逻辑的必然。而心理学视向就正好为意识形态文论的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转换以及具体探讨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独特的审美心理机制提供了很好的进路。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机制对于文艺重要性的研究。

这种心理学对于人的本体论意义却并未受到重视,人们只是在经济基础或意识形态分离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基于这样的情况,马克思后来就有意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社会心理等中介环节的重要作用,关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认为就有一个纯然是社会心理的层面,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归纳了意识形态存在的情感、幻想和思想方式等形式,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就更接近于直接说明社会心理对于意识形态实践性的重要意义了。对于精神观念施与社会经济基础和人们实践活动的改造作用,恩格斯认为:“推动人们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232)}针对意识形态文论研究的机械论倾向对此所可能产生的担忧,恩格斯也显示了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对于后者而言,“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原因”^{[3](248)}。而这种精神要变成具有动力性的存在形式就只能通过社会心理、情感意志等的中介与转换才具有现实性,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152)}而人的现实存在既不是无人身的理性,也不是一种无生命的物理状况,在其现实性上,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各种价值关系结构。而社会心理、情感

社会心理对于意识形态文论研究的重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就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他们的晚期思想里,这一点体现的就更加自觉和突出。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心理学构架,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中就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等中介环节和机制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明确地说过,“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1](258)}与此相类似的表述还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8)}。但是关于

收稿日期: 2006-06-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联立项课题(项目编号: 0606011B)

作者简介: 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文艺理论。

意志、信仰习惯等感受方式与行为方式又直接构成了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意义表征与效果体验。因此,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或直接以社会心理的形式存在才有可能被人们现实地体验和感受,其实践性的作用效果也才可能具有现实性。不但如此,恩格斯还认为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价值关系与动机意识的结构性存在,因此,不管是对经济基础还是对意识形态以及两者的关系来说,我们所遇到的就都只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复杂的关系存在景象,“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其结果就是,“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手段的。”^{[3](247)}它启示我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反作用想要达到改造社会经济基础的目的,不仅要转化为一般的社会心理意识和日常生活情绪的存在,而且还要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与习惯信仰的存在。

二

关于这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关系究竟如何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存在呈一种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在拉布里奥拉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论述中找到非常富有方法论意义的证据。针对那种机械论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简单化观点,拉布里奥拉确认,“在历史社会决定论的领域内永远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原因和结果之间、条件和它所制约的现象之间、先前的现象和后来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不能看出一种线性的直接联系,因为在客观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直接关系,在它们之间还存有诸多的中间环节和其它物质或精神的联结层次,因此,“为了从构成基础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由于找不到另外的术语,我们把这种综合称为社会心理学。”至于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内容,他进一步解释说,

“这种社会心理学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的教义,因为它在大多数场合十分明显和具体,记述型的历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各种思想家一直只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各种思想的鼓动家、演说家和宣传家都求助于和诉诸于这种心理学,因为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人们的特殊意识。”^{[5](61)}这就说明,社会心理虽然负载着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人类普遍性的理性内容,但是在其现象形态和现实的具体运行方式上却是以一种感性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它能够作为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和实践场域的特点所在。

纯粹抽象的、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虽然也可以具有实践的理性规定,但其本身的理论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仅凭自身就能走向现实的实践,所以它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是指转化为社会心理形式存在的感性生活形态。因此对于这种已被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我想说的是比较质朴和平凡的东西:社会意识具体的和一定的形式。”^{[5](62)}例如道德这种意识形态,如果在其实践性的存在形态上和社会心理的形式上就会是这样,“我要谈的是那种在一般人的爱好、习惯、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道德。我要谈的是那种起着作用、即激发或抑制作用,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并表现得比较明显的、而在一切人和每个单个人那里却是零散地表现出来的道德”^{[5](122)}。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斗争在很多时候与很大程度上就通过社会上不同的生活习惯与情感态度而折射出来,“社会利益的斗争表现为新旧习俗和仪式之间的斗争。”“如果说守旧派极力维护旧习俗,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关于对他们有利的、宝贵的和习惯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同关于这些旧习俗的观念牢牢合在一起。如果说革新派憎恶和嘲笑这些旧习俗,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关于这些习俗的观念同关于那些束缚他们、对他们不利的、为他们所讨厌的社会关系的观念结合在一起。”^{[5](181)}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普列汉诺夫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的概念,“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6](195)}由于社会心理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它与经济基础、政治和意识

形态等都保持了一种直接作用的关系态势,基于这样,“要了解某一个国家的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6](272)}“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6](272)}针对一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忽略社会心理等中介因素的机械论意识形态文论研究,他警告说,“忘记了各种社会成分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艺术理论家们闭眼不看这个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历史上能说明很多问题的异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失去了理解艺术史上的许多细节的可能性,而不理解这些细节,就无法摆脱理论上的公式主义和抽象化。”^{[6](273)}正是基于社会心理这种中间的调节和改向作用,所以即便是经济基础性质相同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反过来也一样,“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而在发展程度上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异常不同地配合着,这便使得各个国家有异常独特的‘智慧和道德风俗的状态’,表现于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由于这个原因,同一个问题,可能为法国人所热情地感动,而英国人则淡然置之;同一个论据,可以为德国的先进分子所敬服,而法国的先进分子则异常厌恶它。”^{[6](179)}而且“研究应该指明:经济的枯燥的骸骨怎样为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血肉包裹着,然后——这是任务的最有趣和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的血肉包裹着。可以说,到研究者手里的是死的材料,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充满生命的有机体。”^{[7](183)}这实际上就已经昭示了意识形态文论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实践改造的技术说明和直接作用的机械模式,必须介入到它们相互关系的中介环节和多重制约因素的交互影响方能获得一种内在的理论体验。

三

后来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的有关思想,将这种以社会心理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当作意识形态实践性研究的一种主要对象进行了发挥和展开。葛兰西从反对哲学被特定的专业或职业家所垄断的情况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发的哲学意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这种形式的哲学意识形态就包含在:“1、语言本身中,

语言不只是缺乏内容的语法上的字,语言是一定的观念和概念总体;2、‘常识’和‘健全的见识’;3、人民群众的宗教,从而也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它们是被集体地捆扎在‘民俗’的名称之下的。”^{[8](3)}而这些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其真正的身份就是社会心理,它渗透在人们的生活语言中,因为这种生活语言与那种抽象性的公共理论语言不同,它作为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的载体,彰显的不是一种普遍性而是一种个性,“可以说每个讲话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语言,也就是他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觉方式。”^{[8](32)}只有这种含有倾向性的要素才构成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现实。“最重要的要素无疑地是那种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因素。”^{[8](21)}它直接地要求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不要把哲学活动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8](31)}社会心理直接作用的对象不是理论,而是心态和情绪,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所谓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义项就是关于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整个实践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分析,“对所谓‘自发’运动的忽视、更有甚者鄙视,也就是不能有意识地领导这些运动或不能把它们提高到更高的政治层次,常常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9](161)}卢卡奇对这种理论性意识形态与感性化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和交融的情况就予以了肯定,“不可能有纯粹意识,既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也不可能作为纯粹要求、纯粹义务、纯粹行为规范的纯粹意识。在这里即使要求也有其现实性。也就是说,使无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10](93)}

四

总之,从理论逻辑上看,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是一种互动性的复杂关系存在。一方面,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所由以形成的直接的材料来源,当我们说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存在的反映过程及其结果时,这不过从一种宏观的原则角度对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作了一种最终的方向性规定,至于意识形态究竟通过怎样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来达到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表达,以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是如实还是有所选择,这却不是由经济基础这一个原因所能

决定的。换言之，对于自己的反映客体，意识形态确实不能选择，但是对于自己的直接反映或表达对象，它却能够而应该选择，其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种理性的科学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总是假道于社会心理的棱镜来反映社会存在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对一种情感性与价值性的社会心理活动及其成果的一种再评价与二度选择。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心理也发生反作用，它一经形成又给予社会心理的发展以巨大的牵引和影响，如果缺失了这样的理论规范，社会心理就总是处于一种散朴的零碎化状态，与意识形态的自觉状态相比，它只能反映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对于自己社会关系的一种无意识或自发性认识，在性质上就难免模糊和消极，正是因为这种自发的意识具有盲目性和非自觉性，所以列宁在论述那种工联的改良意识的自发性对于无产阶级的危害时，特意强调发展一种自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自我认识，他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工人运动的自觉意识的代表者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任务，“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11](37)}后来的卢卡奇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重要性的强调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关于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这一规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把阶级意识同经验实际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的差异”^{[10](105)}。而且，只有上升到了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地步，也才可能形成一种对于自己地位和整个社会其它阶级地位以及她们之间关系的总体意识形态，否则就只能沦为一种物化意识，而这对于革命的成功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从特定的阶级地位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竟全然不能觉察现实社会总体的话，因为如果连对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归因于这些利益的深刻思考也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话，那么一个这样的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的作用，就决不能影响历史进程，无论是维持这一进程，还是推动这一进程。”^{[10](106)}关于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也是重视的，对于革命的阶级的彻底革命运动来说，除却具有物质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赤贫的原因以外，解放运动的胜利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12](90)}。所以在强调社会心理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时，也同步地是对意识形态施与社会心理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从总体上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是任何意识形态文论研究都不能忽视的理论质点。应该看到，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心理的

感性因素与社会理论的理性因素的结合体，它们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意识形态实践性的具体内容与机制，后来的哈贝马斯对于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社会心理基础曾经作过非常精当的论述，“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symbolization)。”^{[13](79)}应当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讨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目的，明确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是为了预先估计到意识形态实践性研究的复杂性和曲折过程，这也是为了克服那种在意识形态文论实践性研究方面所可能出现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因为如果没有引入社会心理这个中介环节，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可能流于一种物化的技术性的实践外壳，而不可能深入地揭示出这种实践能动作用的精神实质。它的目的就在于将意识形态从一种科学意识的“思维的真理”中经社会心理的勾兑和渗入而转化为“实践的真理”，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考自身不能使任何事物运动，而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它也是创制活动的开始。”^{[14](123)}这里所说的“有所为的思考”就是已经被社会心理化或者是融入了情感意志和信仰态度等心理性因素的科学形式的意识形态存在方式，它与那种纯然以理论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已经具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有没有社会情绪、意志欲望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因素的参与，就直接将意识形态的性质类别区分开来，它们正像F·施勒格尔对于认识性的理性和实践性的理性的不同特点所作的区分，“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不过是理性的一个类别，一个浅薄而且乏味的种类。也有一种敦厚火热的理性，它使机智成其为机智，赋予坚实的风格以柔韧性和导电性。”^{[15](38)}所以，“不理解大抵根本不是缺乏理解力，而是缺乏想象力。”^{[15](64)}而且在一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上，联系社会心理以及其它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中介环节和机制来进行的意识形态文论研究才可能真正从以前那种纯认识论与科学论的立场和问题框架转换到一种实践性的立场和问题框架视阈中来，所以，从本体论上来研究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不但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意识形态文论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具有根本的实体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下转 470 页)